

资政要览

上

政治卷

主编 赵禄祥 赖长扬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中国历史上的治

乱兴衰，带给我们许

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

教训。维护国家的

统一，制定方针和

政策，促进改革

和发展，关注民

生和民意，乃

是历史的大趋

势，是民心之

所向。

《政治卷》论述了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治乱兴衰的关系两个基本问题。

要

中国档案出版社

资政要览 上

政治卷

主编 赵禄祥 赖长扬

中国档案出版社

选题策划：白 勇

责任编辑：井婉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政要鉴·政治卷/赵禄祥, 赖长扬主编.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80166-985-8

I. 资… II. ①赵…②赖… III. 政治制度-历史-中国
IV. K2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5246 号

资政要鉴·政治卷

ZI ZHENG YAO JIAN ZHENG ZHI JUAN

出版 / 中国档案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 106 号 邮编: 100050)

发行 / 中国档案出版社

印刷 /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700 × 1020 1/16 印张/63 字数/997 千字

版次 /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148.00 元 (上、下册)

序言

《资政要鉴》以专题的形式，着重深入社会实际，探讨了中国历史治乱兴亡的深层次机理。

中国古代史学，虽说有“鉴以资治”的好传统，但此类著作在探讨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机理时，多着眼于政治，过分强调帝王将相的作用，而对社会思潮的演化动向则注意得不够，这就难免有局限性。《资政要鉴》则对国家兴亡、经济运作、社会构造，乃至文化思想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剖析，深入地求索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内在原因。

《资政要鉴》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其中，“政治卷”论述了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治乱兴衰的关系两个基本问题；“经济卷”则分析了中国古代的经济活动以及历代皇朝经济政策的得失；“文化卷”集中分析了社会风气的演化，社会思潮的变易，以及文学与史学，教育与教育制度，封建皇朝的文化思想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社会卷”是将中国社会史以及相关问题作为史鉴对象的首次尝试。中国历史上各个阶段的阶级与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生活与社会活动，乃至各种社会问题，都是“社会卷”所着力探讨的课题。

《资政要鉴》之所以选择这些专题，是因为这些问题是社会治乱的集中表现，是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史实和现象。它不但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而且还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对这些专题所

进行的剖析，不单是一种学术研究，也是一种政策分析和研究。无论是选题还是立意，皆着重于它的史鉴价值。故其撰述宗旨，乃是秉承“善吾师，恶亦吾师”的原则，由“知兴替”而“明得失”。纵观《资政要鉴》的内涵，我们应当把握住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维护国家的统一

纵观中国历史，统一是长期的，分裂是短暂的。维护统一，反对分裂，乃是大势之所趋，民心之所向。所以，坚持统一，反对分裂，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上的统治者，凡是认识和把握住统一这个大势的，虽弱而必强，最终取得胜利，反之必败。自西汉之后的历代皇朝，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康熙治国，均无例外。即便是历史短暂的分裂时期，其民心也一直希望统一，反对分裂，这便是统一必然取代分裂的主要原因。究其本源，是因为统一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而分裂割据首先受害的则是广大人民。

二、要保持社会稳定

社会的稳定，是一切事业赖以发展的基础。然而，稳定社会的前提在于了解社会，顺应民心，这是为历代盛世所证实了的。首先，要明确社会的稳定必须实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政策，其中包括把握社会思潮的演化，民心的向背，制定合理的田赋制度，以及调控各种矛盾，整肃吏治，倡廉肃贪，推行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针，以加强管理。这方面的史实不胜枚举，如周文王以德治国而天下归心，汉初无为而治则出现“文景之治”，以及唐初的“贞观之治”，清初的“康乾盛世”，无不体现了这种精神，其中西汉龚遂治北海郡，便是怀之以德，劝民发展生产，因而“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同时，对于对不法分子的严惩，也是顺应民心，稳定社会的重要政策。如西汉时济南豪猾鬲氏家族三百余口横行乡里，官不能治，郅都为济南守，便依法诛鬲氏之首恶，使“郡中不拾遗”而大治。康熙时期的清官廉吏，更是有口皆碑，于成龙一类人物的出现，便成了体恤民情，稳定社会的楷模。

三、要稳固经济基础

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的稳固，乃是立国之本，是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所以成为中国历代治国安天下的永恒主旨。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稳固经济基础主要是指发展农业生产，其次是工商业的发展。古人对于发展经济有本末之分，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并重本而轻末。但是，从事商贾末业者，其利益远胜过本业的农耕，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民心之浮动，从而危及经济基础的稳固。这就必须调控农商的赋税政策，以发展生产。如刘邦建立西汉皇朝的初期，就颁发了重农抑商的禁令，并推行“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减轻农业税，以刺激农业的发展。唐初的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并以“必先利民”为国策，唐宋以后对赋税制度的不断完善，对农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另外，为了稳固国家的经济基础，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起变法活动，如先秦的商鞅变法和西门豹治邺，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的变法，都是力图稳固国家的经济基础。故历来的有识之士都非常重视改革开放，用以稳固经济基础。

四、要重视和加强文化教育事业

尊师重教，加强文化建设，其意在普遍提高国民的素质，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十分必要。因为尊师重教和加强文化建设的顺利推行，不单是提高人们一般的文化水平，发展科学事业，还起着纯洁社会风气，净化人们的心灵，使社会运转有序，使中国的优良品德上升到一个相当的水平。为达到移风易俗，纯化人们心灵的目的，中国的先贤们前后相继，不遗余力地做着这项工作。所谓重礼仪，讲文明开始于三代（夏、商、周）。孔子继三代诸贤之后而创立私学，“有教无类”，并整理《诗经》，研究《易经》以及《礼》、《乐》等文化典籍，发展文化事业，起着纯洁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其后，如西汉蜀郡守文翁的尊师重教，就改变了当地文化落后的状况，后世的唐宋乃至明清，一直延续了尊师重教，重视文化建设的优良风气，出现了不少的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和道学家等，其著名者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司马光、程颐、朱熹、皇阳明、汤显祖、曹雪芹

等，不胜枚举。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而精神文明的建设乃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勤劳刻苦、热爱国家、重视人伦、尊老重孝、倡导节气、扶危济困、公而忘私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素养和道德风范的有机组成部分。诸多的先贤们都以道德教化为己任，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成为中国古代道德修养和理想追求的最高境界。

《资政要鉴》的编纂，是在继承中国古代史鉴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其意在于力图从社会的更深层次探讨可资借鉴的治国要领。我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参加本书编著工作的有：商传、李世愉、田人隆、谢保成、朱耀廷、黎虎、施建中、孙恭恂、曹大为、陈琳国、李树喜、孔繁敏、王培真、史为民、王朝中、刘驰、刘洪波、李宝柱、马宝珠、王建吉、孟世凯、李华瑞、赫志清、魏明孔、陈高华、萧发生、方志远、郭松义、朱浒、任宝菊、李学东、翁殿璧、武四海、岳会仁、李雪屏、王君、张崇发、林吉旺、梁海俊、饶江山、杨祥峰、杨军强、梁洪心等先生。

编 者

2008年12月

目录

上册

民心向背与殷周兴亡	(1)
战国变法与七雄沉浮	(20)
武力兼并与强权外交	(44)
任贤用能变法图强	(66)
皇权更迭的历史哲理	(91)
皇权世袭制的困惑	(109)
地方集权中央的新模式	(128)
法制得失与秦亡汉兴	(141)
汉朝君相职能的协调和矛盾	(166)
汉朝治国方略的调整	(190)
秦汉官吏的监察与考课	(214)
外戚专权与汉朝衰亡	(236)
宦官干政机制的分析	(263)
分裂与统一的历史反复	(282)
门阀士族的兴衰	(297)
魏晋南北朝用人原则和选官制度的变迁	(312)
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的曲折历程	(326)
隋朝的统一与速亡	(349)
唐太宗君臣“论史议政”与“贞观之治”	(366)
从贞观之治到武则天专政	(380)

唐玄宗时期的治乱更迭	(397)
唐后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411)
唐朝宦官专权的历史特点	(430)
宋辽外交与澶渊之盟	(448)
宋金“海上之盟”的得失	(468)
宋夏和战	(490)

下 册

辽朝初年的政治动乱与世宗革新	(523)
外戚与西夏政治	(543)
从金熙宗到海陵王的改革	(554)
成吉思汗的统一事业	(568)
民安国强的洪永盛世	(587)
从叶淇变法到张居正改革	(608)
晚明城市民变	(627)
关于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	(646)
内务府的创立及对宦官的管理	(699)
清代严格的回避制度	(714)
康熙盛世与廉政	(736)
统一台湾	(755)
清代秘密立储制度的创设	(769)
土尔扈特蒙古万里回归的启示	(793)
闭关政策及其危害	(809)
落后挨打的晚清外交	(826)
废止科举对乡村教育的负面影响	(847)
中国古代自然灾害与对策研究	(862)
唐初对于自然灾害的认识及其赈灾决策	(902)
北宋治河与防边	(914)
元朝的常平仓和义仓	(932)
明代前期荒政中的腐败问题	(949)
清代的灾害和农业	(970)

民心向背与殷周兴亡

周朝取代殷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尽管史学家对这种更迭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或者认为它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或者认为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但是对这种更迭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都是肯定的。

对于殷周兴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分析。为了突出史鉴的效果，我们选取了民心向背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大邑商”为什么会衰亡，乃至最后为弱小的周所取代。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主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家的一切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其根本的目的应在于安民，使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在中国历代王朝存亡相继的历史轮回中，如果一个新王朝的统治者能够使人民群众达到一定程度的安居乐业，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就会出现一个强大而充满活力的大一统王朝，甚至会出现一个令古代史家称羡不已的盛世，反之以乱济乱，这个新王朝就会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民心向背成为王朝兴亡更迭的契机。旧王朝的统治者由于失掉民心，于是酿成动乱，甚至丧失社稷江山；新王朝的统治者从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不仅夺取了天下，而且巩固了政权。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殷亡周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从历史鉴戒的角度来

说，它还不失为一条原则。及至后世，凡是能以前朝灭亡为鉴，力除前朝之弊的统治者，才有资格王天下，建立新的王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是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这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好传统。

让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来分析一下夏亡商兴的历史事件，并由此揭示所谓“殷鉴”的核心是什么。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第二个王朝，自成汤建国至商纣灭亡，共经历了十七代，三十一王，前后约六百年。

商朝的祖先成汤灭夏时，夏朝的末代君主桀暴虐无道、残害人民，侵夺诸侯，以至天怒人怨。成汤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领导各路诸侯打败了夏桀，灭掉夏朝，建立了商朝。史籍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①，认为夏亡商兴是上顺天意，下得民心之举。关于汤武灭夏革命的合理性，后来成为儒者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商 汤

伊尹是帮助商汤灭夏的头号功臣，他曾奉商汤之命进入夏都，以向夏桀献土特产为名在那里住了三年，暗中窥探桀的动向。有一次，他借献酒之机见到桀，并试探性地说：大王不听群臣劝谏，亡国为时不远了。夏桀却以为伊尹是在妖言惑众。他说：天上有太阳，我就是天上的太阳，太阳是永远存在的，只有太阳亡，我才会亡。然而伊尹在民间却看到另一种情况：人民痛恨夏桀的暴虐，天天指着太阳咒骂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②意思是，这个太阳为什么还不灭亡，我们愿意与你一同灭亡。伊尹回到商

① 《周易·革》。

② 《尚书·汤誓》。

邑后，将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向成汤汇报，并认为夏桀已经失去民心，可以征伐。

商汤在讨伐夏桀时，历数其两大罪状，一是破坏农业生产，二是不恤百姓。据史书记载，汤武是这样声讨夏桀的：

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①



伊 尹

又指责夏桀：

桀为瓦室……征丝灼之，务以费民 [氓]。赋敛无度，杀戮无方。杀人六畜，以韦为囊。囊盛其血，与人悬而射之，与天帝争强。逆乱四时，先百鬼尝。谏者辄死，谀者在旁。圣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数枯旱，国多妖祥。螟虫岁生，五谷不成。民不安其处，鬼神不享。飘风日起，正昼晦冥。日月并蚀，灭息无光。列星奔乱，皆绝纪纲。以是观之，安得久长！^②

春秋初期，齐桓公问管仲商灭夏的原因：“汤以七十里为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仲回答说：“桀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柎，以观冻溺。弛牝

① 《尚书·汤誓》。

② 《史记》卷128，《龟策列传》。

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竟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天下也”。^① 管仲从桀与汤对待百姓的不同态度作了对比，分析了桀亡汤兴的根本原因：一个是失掉民心，一个是赢得了民心。司马迁也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② 这是很有道理的。而孟子则作了更为形象的比喻，他说汤征桀时，“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③ 所有这些议论，都是对夏朝灭亡原因的总结。

汤建立商朝之后，统一了自夏朝末年以来纷乱的中原，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所以商代的后人称颂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④ 意思是说，商汤之时，远在西方的氐人和羌人都不敢不来进贡和朝见，都说商汤是他们的君主。

汤从夏桀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他认识到，要使国家兴旺，必须得到百姓的拥护，要使人民拥护自己，就不能对人民施暴政。汤在伐桀灭夏的过程中，已注意到对人民施以恩德，并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对伊尹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⑤ 意思是说，人往水中看，可以看到自己的形象；从人民的对统治者的态度中，就可以知道国家治理得怎么样。汤从自己灭夏兴商的政治实践中深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所以，在建立商朝之后，立即废除夏朝的繁重赋役，禁止对百姓横征暴敛，给人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建国不久，王畿内发生了一场旱灾，而且延续了七年之久，烈日暴晒，河干井涸，草木枯焦，禾苗不生，庄稼无收，人民异常困苦。汤心情十分焦虑，他与伊尹商量缓解灾情的措施，教民开沟打井，引水灌溉，终于解除了旱情，以此受到诸侯和人民的拥护。汤还承袭夏朝的制度，出外巡视，以此了解民情和稳定地方。盘庚即位后，商朝出现了统治危机，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盘庚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国王，他想效法祖先成汤那样来一番变革，以使商朝转危为安，但遇到很大的阻力，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仍未使局面有大的改

① 《管子·轻重甲》。

② 《史记》卷2，《夏本纪》。

③ 《孟子·滕文公下》。

④ 《诗经·商颂·殷武》

⑤ 《史记》卷3，《殷本纪》。

观，于是他决心再次迁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盘庚迁殷”。他训诫臣下和贵族，不要贪图安乐，要勤勤恳恳地为国效力。要弘扬祖先美德，救民于水火。如有不从，必将受到天罚。由于君臣上下努力，很快就扭转了混乱局面，克服了商王朝的统治危机。

盘庚迁殷的重要意义，不仅是统治中心地理位置的转移，而在于他重新恢复了祖先创立商朝时的好传统。成汤之政的核心在于安民，以民为本，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打败了暴虐的夏桀。而盘庚借迁都的契机，行汤之政，艰苦奋斗，克服贵族官员中贪图享受、不思进取的坏风气，从而收到了安定百姓的效果，使商朝重新出现了兴旺的气象。正如史书所说：“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①

盘庚行汤之政，恢复祖先创业的美德，以安民为本的做法，后来为武丁继承和发扬，从而使商朝出现了兴盛气象。

盘庚去世后，其弟小辛继位。小辛死后，其弟小乙继位。武丁就是小乙之子。他年轻的时候，奉父之命离开都城，隐居于黄河岸边，以普通百姓的身份长期生活在民间，了解民情风俗，体会稼穡艰难，即所谓“小人”的劳作之苦。作为统治者的武丁，不仅以此逐渐学习了治国之道，而且与普通百姓乃至地位卑贱的奴隶和罪犯在感情上也有了某些沟通之处。后来成为他的得力辅佐的傅说，原来是一个“胥靡”，即罪犯。武丁在服刑场所与傅说交谈，傅说对武丁谈了自己犯罪的经过，还向武丁分析了罪犯多的社会因素。尽管对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但武丁在了解情况之后，仍然承认，罪犯多说明朝廷治民有失德之处，人民因不得安居才会违犯法纪。傅说后来被武丁请到朝中，出任相职，在拓展疆域，发展农耕，安定人民生活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武丁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与成汤并列的“盛君”。

商朝的兴盛时期大致维持了四十多年，至祖甲之后，商朝开始衰落。商朝之所以立国，并呈现兴盛之势，是因为始终记得百姓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把安民放在施政的首位。而商朝的衰落，也正是因为忘记了这个浅显平凡的真理，丢掉了祖先的好传统。商朝灭亡后，周公姬旦曾发表评论说：

^① 《史记》卷3，《殷本纪》。

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①

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对立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这种对立的阶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因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总是有互相依存的一面。作为凌驾于两大对抗阶级之上的国家来说，它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将这种对抗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个称职的统治者，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周公就认为，作为一个统治者，要“知稼穡之艰难”，“闻小人之劳”。如果一个统治者不务于此，而一味骑在老百姓的头上养尊处优，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就一定会把国家大事搞糟，甚至使国家灭亡。商朝之所以衰亡，其根本原因在于此，商朝之所以亡在纣王的手里更在于此，后世王朝的灭亡也在于此。

纣王的荒淫暴虐、贪图享受，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

纣王嫌商都玩的地方太小，就下令在商都南面的朝歌和北面的沙丘又修建离宫别馆，林苑亭台，别有一番景色，纣王经常带着一批美女、歌姬和近臣，往来于离宫，尽兴游玩。他命人在朝歌修建了一个十分壮观的鹿台，又“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就是为后世谴责商纣王的主要罪状的“酒池肉林”。为了玩乐，甚至“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②。纣王的恣意挥霍，耗费了大量资财，他又将这些花费转嫁至老百姓头上，下令增加赋税的征收，属国进贡的方物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纣王淫乱不止，盘剥百姓，使百姓怨声载道，诸侯离叛。纣王不思反省改过，反而用极为残酷的手段来加以虐杀，他想出了一种“炮烙之法”，即用青铜铸造一根中空的柱子，将人绑在柱上，下面烧火，以此将那些无辜的人活活烙死。这更引起了统治集团中不少正直人士的忧虑。纣的叔父比干、其兄微子多次劝谏，纣王根本不听。旧臣祖伊去鹿台劝谏，他对纣王说：

① 《尚书·无逸》。

② 《孟子·滕文公下》。

“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祖伊希望纣王畏天命，不要以淫虐自绝，为天所弃，纣王不但听不进这种逆耳忠言，反而狂妄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①以天命自恃，继续胡作非为。微子为了避祸，便逃到民间躲了起来。纣的另一个叔父箕子装疯混在奴隶中间，纣即派武士将其抓回囚禁。比干冒死进谏，纣王拒不见见，比干三日不离王宫。纣王恼羞成怒，竟丧心病狂地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诸？”下令杀死比干，剖胸挖心。朝中大臣见纣对自己的长辈都这样残忍，不少人逃出商都，投奔周。这时，纣已完全成了为百姓痛恨、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不久，周武王率兵声讨，牧野一战，商朝的乌合之众“前徒倒戈”。纣王逃至鹿台，自焚而死。

商朝的灭亡和纣的自焚而死，自然是一出历史悲剧。然而，这出悲剧了无新意，我们如能将商朝的老祖宗成汤从阴间请出来，让他用声讨夏桀的罪状来指责他的不肖子孙，不也十分合适吗？成汤之所以能灭夏立商，是因为真正懂得“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含义，着力于安民。而商朝之所以灭亡，又恰恰是因为其末代子孙商纣王忘记了“殷鉴”，违背了“殷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用在这里倒也十分合适。这种悲剧，将要在日后的中国历史上不断地轮回上演。

二、西周立国：得人心者得天下

牧野一战的失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然而使商纣王丧失天下的并不在于武力，或主要不在于武力。

商王朝曾经是天下的共主，西周不过是西部的一个邦国，论实力，远不如商王朝，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也与商相去甚远。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小邦国，却灭亡了不可一世的“大邑商”，其主要原因何在？对于这个问题史有定评：商亡周兴，首先是一场争取民心的较量。孟子曾说：

^① 《史记》卷3，《殷本纪》。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圯也。故为渊驱鱼者，獯也，为丛驱爵者，鹵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①

这段话说明了一个千古不易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旧王朝的灭亡，究其实并不是新王朝的强大，不是新王朝打败了旧王朝，而是旧王朝失掉了老百姓的拥护，从而自己打败了自己。新王朝由此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才得以取而代之。夏桀、商纣淫虐而失民心，必然自取灭亡；武王因行仁政而得民心，从而建立了周朝。这就是殷亡周兴的主要原因。

殷朝的灭亡是一出悲剧；对于周国来说，则是一出喜剧。周武王正是用了商汤灭夏的老办法打败了商纣王。

西周原来只是商王朝西部的一个邦国，姬姓。商纣王时，西周的国君为姬昌，他死后谥文王，史称周文王，其子即灭亡商朝，与成汤并称的周武王。

姬昌曾经被商纣王幽禁在美里，周国的心腹大臣姜尚等人设法营救。他们投纣王所好，物色了一个美女送给纣王，又送给纣王宠臣费仲许多骏马、美玉珍宝。纣王为美色所惑，竟神魂颠倒地对周臣说：“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不但下令释放姬昌，而且赐以弓矢、斧钺，以示授予征伐之权。这样一来，姬昌不但麻痹了纣王，而且利用纣王所授予的权力，着力经营，扩大自己的势力。当时，虞、芮两地发生矛盾，姬昌就出面进行调解。虞、芮之人对此感到十分惭愧，互相说：“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双方谦让，妥善解决了争端。这件事对周边的诸侯有很大的影响，都一致认为：“西伯盖受命之君。”^②此后，西周逐渐控制周边的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大力推行以安民为目标的一系列措施。如提倡敬老慈少，尊贤下士，节制赋税的征收，提高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这些措施，使西周控

① 《孟子·离娄下》。

② 《史记》卷4，《周本纪》。